

走向卢沟桥事变之路

1927-1937年中日关系

袁成亮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学术研究文库

走向卢沟桥事变之路

——1927—1937 年中日关系

袁成亮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卢沟桥事变之路: 1927 ~ 1937 年中日关系/袁成亮
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12

ISBN 7 - 80626 - 628 - 3

I . 走... II . 袁... III . 中日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1927 ~ 1937 IV . 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987 号

走向卢沟桥事变之路

——1927 ~ 1937 年中日关系

袁成亮 编著

责任编辑: 林革华

封面设计: 李岩冰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长春市康达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30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ISBN 7-80626-628-3/K·180

作者简介

袁成亮,1964年生,江苏常州人,中共党员,历史学硕士,副教授,现任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在学术方面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现当代中外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述有《中华民国外交史纲(1945——1949)》(张圻福教授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国革命史论》(副主编)等,在多种刊物上公开发表《试论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试论战后台湾的历史地位》等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被收录于《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等论文集,曾获铁道部“全路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并被编入《中国百科学者传略》等多部辞典。

序

“七·七”卢沟桥事变距今已整整 63 个年头了。这一段辛酸的血泪史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无法用文字表述的。“卢沟桥事变”留给人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因此一直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瞩目,尤其是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探索付出了大量心血,近年来一批鲜为人知的史料陆续公布,一部部论著不断出版,使抗日战争研究这块园地硕果累累。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1937 年以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已有不少论著发表,且较系统完整,这对于我们研究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过程、影响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史学界对于 1927 年国民党蒋介石上台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相对来说显得较为薄弱。作者作为一个年轻史学工作者,不畏艰辛,从做研究生时就开始接触这一课题,并发表多篇论文,在此基础上,历经数年,终于完成了《走向卢沟桥事变之路——1927 - 1937 年中日关系》这一著述,值得庆贺。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加深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对于日本侵略者对外扩张侵略本质属性及其凶残狡诈面目的认识,对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维护一党专政私利,排斥异己,独裁专制,实行对日妥

协屈辱外交本质的认识,都是十分有帮助的。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说,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是十分可贵的。

历史事实是无法涂改和抹煞的,我们揭露它是为了正视它,并从中吸取教训,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日本应以愧疚之心进行深刻反省。但是,时至今日,仍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闭眼不承认历史事实,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美化战争,为其侵略扩张政策辩护,妄图重温军国主义的迷梦。全世界爱好正义和平的人民,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复辟,但愿这一著作能起到这一警示作用。

张圻福

2001年2月

前 言

1927—1937年中日关系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虽已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总的说来,成果不多,且多呈零星状态,缺乏系统。这与整个抗日战争研究现状是极不相称的,而就目前来说,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其一,搞清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演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日本对华战争性质的认识。通过日军在华诸如南京大屠杀等种种暴行来揭示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本质固然重要,但通过对日本上层集团对华政策演变的剖析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一时期,日本统治集团对华扩张由东北至华北,并进而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它充分展示了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本质绝不是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标榜的那样是为了“将亚洲从白种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是要将中国等亚洲国家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同样,日军在华种种暴行也决不是象日本国内有些人所辩解的那样是少数人的“个人行为”,而是日本统治集团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谎言是掩盖不了铁一般的事实。

其二,搞清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演变还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性质的理解。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蒋介石南京政府内外政策是以如何维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及自身统治为基点的。当日本侵华范畴尚限于对蒋介石

石集团无根本利害的东北地区时,为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反动国策,全力镇压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蒋介石南京政府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对日妥协,甚至不惜出卖东北来换取与日本和局。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由东北伸向蒋介石集团有较大利益的华北地区时,蒋日矛盾便开始趋于激化,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日政策也随之开始转趋强硬。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两种单一力量的斗争、较量,其它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如国际形势的发展、英美对日态度的变化、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的日益高涨等因素对于蒋介石南京政府走上抗日道路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演变对于如何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维护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短短几年内就控制了日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动了一系列侵华事件,成为亚洲战争的策源地,这也是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对日本法西斯妥协的结果。残酷的历史告诉我们,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世界和平,整个世界必须团结一致,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决不能对它有任何轻视、幻想,更不能目光短浅,为了一国之私利牺牲他国利益而对侵略分子采取纵容态度,否则英美等国对日妥协,损人损己现象不难再现于今日。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无情的历史已屡屡向全世界昭示了这一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

最后,加强对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对华政策及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理解,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对华政策及南京政府对日政策演变,也都可以从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演变中找到它的渊源。

鉴于上述认识,笔者不昧浅陋,经多年努力,撰写了这本学术专著,以期对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有所补益。下面笔者就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演变作一扼要介绍,以便使读者对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从1927年“东方会议”日本政府分离满蒙政策的确定到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由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南京政府由对日妥协到自卫抗战,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日关系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

—

1927年4月,对华持“亲善外交”的日本若槻内阁倒台,一向致力于分离我国东北的军国主义分子田中义一组成新内阁。田中上台后于6月27日至7月7日召开了“东方会议”,确定了以“分离满蒙为重心”的日本对华政策,即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并以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我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及反共亲日为前提支持其对中国的统一。田中上台之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南京政府正积极进行以攻取徐州为目的的第一次北伐,田中内阁为阻止蒋军北进,遂以“保侨”为名出兵山东。而蒋介石第一次北伐由于攻打徐州失利而受挫,蒋本人也在桂系逼宫下被迫下野。蒋下野后在张群等陪同下前往日本与日朝野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并与日签订了《日蒋密约》,同意日本在我国东北特殊权益以换取日本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但在南京政府北伐统一中国的时间上,蒋介石与田中发生了争执,因田中早已确定继续扶植张作霖作日本统治我国东北的工具,为确保日本满蒙政策万无一失,在张作霖接受日本条件撤出关外之前,他不愿南京政府立即北伐。在访日期间,蒋介石还通过与美驻日特使签订《蒋美密约》及与宋美龄联姻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系。

蒋介石访日回国后即于1928年2月开始了南京政府第二期北伐,田中内阁为阻蒋北上,再次出兵山东并制造骇人听闻的济南“五·三”惨案。面对日军的残暴行为,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态度,为避免与日军冲突,蒋军绕道继续北伐。而张作霖在大势已去的情形下,为东山再起被迫允诺日本条件,并在张学良等劝说下撤兵关外。6月4

日,不满于田中扶张(作霖)政策的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毙张作霖,企图借此出兵东北,实行对满蒙的直接占领。由于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冷静处置,关东军阴谋遂未得逞。“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子承父业,出掌东北大权,并顶住日本压力,经过与南京政府多次秘密协商于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归附南京国民政府。田中内阁分离满蒙政策遭到彻底失败。1929年7月,田中内阁在内外交困中倒台,继之而起的滨口雄幸内阁重新打出币原“协调外交”的旗帜并与南京政府达成了久而未决的《中日关税协定》,日本对华政策转趋软化。然而中日关系这种缓和只不过是日本武力侵略我国东北前的暂时平静。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使日本经济大幅度滑坡,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内人民斗争视线,日本在加强对我国东北经济掠夺的同时,开始了军事占领满蒙的准备。在一片武力解决的叫嚣声中,以中日治外法权问题谈判为转机,日本政府也放弃了和平解决满蒙政策,并与军部约定以一年为期作武力解决满蒙的外交准备。其后,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挑衅日甚一日,其中尤以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最为引人注目。

当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侵略我国东北之时,蒋介石南京政府却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并针对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制订了对日“不抵抗政策”要张学良东北军严格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侵华急先锋关东军,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为名发动了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尽管这次行动事先未曾得到日本政府的许可,但鉴于关东军行动已成事实,加上关东军冒险成

功,日本政府与军部事后均予承认。只是为了迷惑国际视听,日本政府才发表了一个所谓日本对满蒙没有领土欲望的“不扩大方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按既定方针一面令张学良对日不抵抗,一面令中国驻国联代表将此事诉诸国联“公理解决”,并因此拒绝了日本关于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要求,对日采取了“不交涉外交”。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张学良东北军不战而退,东北大部迅速沦亡,而蒋介石依国联公理解决“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也因英美法等国及国联的自私软弱一无所获。随着对国联“公理解决”的失望,蒋介石开始改变了对日“不交涉外交”。11月25日,蒋介石起用一向主张对日交涉的顾维钧为外交部长负责对日交涉。同时,南京政府还向国联提出“锦州中立区计划”,企图借列强对锦州的“国际共管”来阻止日军对关内的进攻。此策由于英美法等国对日软弱及国人的强烈反对而失败,蒋介石本人也因对日“不抵抗政策”而被迫下野。1932年1月3日,日军攻占锦州,东北三省至此全部沦亡。

锦州失陷后,继蒋(介石)上台的孙科过渡内阁为骗取国人支持以及国际同情打出了对日“绝交宣战”的旗帜。蒋介石深恐孙科此举激怒日本,堵塞其日后对日交涉之道,便采取“联汪(精卫)排孙(科内阁)”策略,迫不及待地孙科内阁赶下台去。1932年1月28日,蒋汪联袂入京,重返政坛,并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实际是蒋独裁)的蒋汪合作局面,南京政府对日交涉方针开始进入较为稳定的实施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同时,还着手伪满洲国的制造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与日本政府“不扩大方针”相适应,关东军放弃了将满蒙直接划入日本版图的“直接占领”政策,而采取了利用溥仪建立由日本直接控制的伪满洲国来达到控制我国东北的目的。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替伪满洲国工作打掩护,1932年1月28日,日本对英美法等国在华利益最集中的上海发起了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提出了“一边抵抗,一边交

涉”的对日方针(实际上是“只交涉,不抵抗”),一方面极力压制 19 路军及广大人民抗日运动,另一方面乞求英美等国出面调停,同时暗中与日本作非正式交涉。最后,在英美对日“拉偏架”式的调停下,南京政府派代表与日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不仅通过“一·二八”事变为伪满洲国的出笼打了一场成功的烟幕战,而且还取得了在上海的驻兵权,为日后进一步侵华创造了条件。

在“一·二八”炮声中制造了伪满洲国以后,为了使国际接受这一既成事实,日本政府又一反前态要求国联组织调查团对中日问题进行调查。而国联为了从“九·一八”事变不利处境中拔出脚来,避免自身威信进一步受到损害,欣然接受了日本这一要求,并派出了以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对中日问题作所谓“公正”的调查。这次调查将西方列强及国联自私自利的真面目暴露无遗,李顿调查团在调查报告中一方面不满于日本对东北独占政策,认为日军在“九·一八”之夜的行为及伪满洲国不合法,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为日本行为辩护以求日本谅解,并提出所谓国际共管东北(实际是英美法日等大国共同控制东北)的主张。南京政府对李顿报告书竟表原则接受,而日本方面则因报告书不承认伪满洲国而愤然退出国联,南京政府依赖国联政策至此遭到彻底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伪满洲国在西边是以长城为界的。为了“完善”伪满洲国的领土,日军于 1933 年 1 月 3 日占领山海关后又向位于长城以北的热河省发起进攻,并将战线一直推进到长城各口。在日军进攻面前,蒋介石南京政府继续推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依然寄希望英美出面调停。然而热河非上海可比,英美在此并无多大利益,因而对此事均不积极。在此情形下,蒋介石便诚惶诚恐地走上了单独对日交涉之路,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占领。“九·一八”事变终以蒋介石对日妥协,东北四省全部沦亡而告结束。

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向南京政府提出解决关内外通车、通邮、设卡等东北善后问题。南京政府为避免国人攻击,乃授意华北当局不得在文字上承认伪满洲国原则下与日进行地方交涉加以解决。交涉结果,在中日签订有关协议中虽无承认伪满洲国的字样,但其内容本身等于确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而南京政府战区接收也因日方百般阻挠而成了一纸空文。日本对我国东北独占政策在国际上引起了英美等国的不安,他们惟恐日本将这种政策扩展到全中国而严重损害其在华权益。为阻止日本对中国的独占,同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塘沽协定》后,美国与南京政府签订了《中美棉麦借款合同》、《中美航空密约》,英法操纵的国联也借“技术援华”为名进行经济扩张。英美等国对华经济活动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1934年4月17日,日本政府唆使情报部长天羽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公开排斥英美对华经济援助活动。该声明一出笼便立即引起英美等国的谴责,英美还就此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多次交涉。尽管日本政府始终未对天羽声明加以否定,但由于迭次保证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对此也不再深究了。

“天羽声明”风波平息后,为使南京政府投入日本怀抱,日本政府便以经济援华相引诱,劝南京政府不必与英美打交道。其时,美国为解决金融危机而实行的高价收购白银政策使以白银为金本位的南京政府白银大量外流,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南京政府为此多次要求美国停止高价收购白银,但均遭拒绝。为稳定金融秩序,南京政府又转求英国借款,但英担心此举影响英日关系也未接受。对英美的失望以及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再加上“攘外必先安内”固有政策的影响使南京政府不惜饮鸩止渴,经不住日本的诱惑,1934年12月,蒋介石以徐道邻名义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向日本发出求和信号。1935年1月,日本广田外相以“不侵略,不威

胁”为主题发表对华政策演说以示响应。随后,王宠惠访日、日本经济代表团访华等一系列亲善活动相继展开,中日关系也在这种亲善气氛中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

然而,就在中国亲善闹剧登台亮相之时,日本对内蒙及华北的侵略也暗中拉开了帷幕。1934年12月7日,日本冈田内阁正式确定了分离华北政策,与此同时,日本策动的内蒙自治事件、察东事件、新生周刊事件也相继发生,这些事件为南京政府中日亲善的幻觉抹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四

继侵占了我东北四省后,193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将对华侵略重心转向了华北。由于自身准备不足以及出于国际因素的考虑(华北也是英美在华较敏感的地区),日本对华北采取了不同于东北的“谋略”政策,即利用旧军阀、华北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之间的隔阂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最终使华北脱离南京政府成为“满洲国第二”。为遮人耳目,日本华北自治工作主要是由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共同协作并采取地方交涉来进行的(1936年1月后由华北驻屯军单独负责)。1935年5、6月间,日本借口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及中国方面违背《塘沽协定》援助抗日义勇军孙永勤为名强迫华北当局与其达成了《何梅协定》,将南京政府中央势力赶出华北。随后,日方又借张北事件将宋哲元29军赶出察哈尔省,在冀察地区造成了一个真空地带。紧接着以香河自治事件为起点,以宋哲元为重心,日本在华北掀起了以军事威胁为后盾的“华北自治运动”的阵阵恶浪。

日本对华北侵略的不断加深打破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日亲善的美梦,蒋介石对日态度由此开始发生转变。1935年11月2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作了对日外交“最后关头”的演说。同一天,在与日驻华大使有吉会谈中,蒋又明确要求日本取消“华北自治运动”。对日在华北举动,英美也相继发表声明表示关注,鉴于此种情形,日本

决定暂缓华北自治。1935年12月18日,南京政府在华北设立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对此也表接受。该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半独立的地方实力派政权,它也是宋哲元“舍小利保大权”周旋于蒋日之间的结果。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为控制该政权,并以此为基点将其统治区扩展到全华北,日本加强了对南京政府与宋哲元的逼迫并于1936年上半年大幅度增加华北驻军人数,还策动了以冀东为中心的大规模华北走私活动,日本这两项举措极大地刺激了南京政府,尤其是华北走私使南京政府财政损失惨重,中日关系因此出现大幅度滑坡趋势。

在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同时,日本政府则于1935年10月向南京政府提出旨在使中国全面屈服的“广田三原则”,南京政府先是表示愿意在日本中止“华北自治运动”前提下加以考虑,并要求日方取消《塘沽协定》、《上海停战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协议。在遭到拒绝后,南京政府又于1936年1月公开发表否定“广田三原则”的声明。其后,日本以放弃对华“双重外交”以及“共同防共”为名诱导南京政府接受“广田三原则”的阴谋也以失败而告终。

五

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五相会议制订了以“南北并进”为主要内容、称霸世界的战略性纲领——《国策基准》,这一纲领制订标志着日本将全面侵华提到了议事日程。因为,“南进”也好,“北进”也好,控制中国是其要走的第一步。为此,日本内阁会议还专门制订了《对中国实施策略》、《第二次处理华北问题纲要》。为迫使南京政府全面屈服,1936年8、9月,日本在华又先后挑起成都事件与北海事件,企图借此压迫南京接受“广田三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中日问题。对此,南京政府也抱着调整中日关系的最后希望派张群外长与日驻华大使川樾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方坚持成都、北海事件作为地方

问题处理,反对与调整中日邦交混为一谈,并提出华北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放弃过去“地方交涉”的做法。但南京政府主张遭到日方拒绝,中日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

在张群川樾会谈同时,日本还暗中指使伪蒙军进攻绥远,挑起了绥远事件,驻守绥远的傅作义部在人民支持下予敌以沉重打击,并收复了百灵庙。绥远事件进一步恶化了中日关系,南京政府对日提出强烈抗议,并主动中止了张群与川樾的谈判。与此同时,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及绥远抗战胜利鼓舞下,张学良与杨虎城率部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西安事变”爆发后,日本一方面采取“静观政策”,另一方面伺机导发南京与西安的大规模内战,企图使中国亲日派取蒋(介石)而代之,从中渔利。由于中共的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也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朝抗战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中日谈判的破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国内抗日大趋势的形成使日本深感不安,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倒台,继之而起的林銑十郎内阁决定中止“华北自治运动”,在加强经济掠夺的同时,对华推出了所谓以“平等”为基础的“佐藤外交”,重新亮出中日亲善的旗帜,企图以此诱骗南京政府改变现行政策,转向亲日。然而,南京政府对此反应冷淡。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对外方针中还首次提出“抗战”一词,受此影响,宋哲元对日态度也日趋强硬。“佐藤外交”因此陷入绝境。5月31日,林銑内阁倒台,日本军国主义头子近卫文麿组成了战争内阁,并于7月7日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一面要宋哲元加强防备,并调集大军北上,另一方面又默认宋哲元作和平解决之努力。而日本政府为迷惑蒋介石南京政府又抛出了所谓的“不扩大方针”,并与南京政府及华北当局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日本和谈只不过是缓兵之计,随着

援兵到达,日军对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并于7月30日占领平津。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将战火燃到黄浦江畔。14日,南京政府由于对日和平绝望发表“自卫抗战”声明。17日,日本也公开放弃了“不扩大方针”。中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国人民从此进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八年全民族抗战时期。